



16、17 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

蒋 焰

摘要：新闻文化的兴起是英国 16、17 世纪一个较为突出的历史现象。在都铎晚期，逐步形成了以口耳、手书和印刷新闻为基础的传播格局，尤其是小册子的显著增长，为新闻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在人们了解时事和进行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作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随着新闻书的出现以及口耳、手书等传播形式的进一步成熟，新闻文化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愈为紧密，并对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新闻文化的兴起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

关键词：英国；近代早期；新闻文化

“有什么新闻(What news)”，这是 16、17 世纪英国人见面时最常问的问题之一。“新闻”作为人们日常社交的一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在 1565 年的一篇小册子中就曾提到时人对新闻的渴求。“有什么关于教皇、皇帝、国王们或马丁·路德和土耳其人的，以及这样和那样事情的……新闻或消息么？”^①在 1591 年的一篇小册子中也描述到：“每个人都在忙着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幻想(和好奇心)：人们传递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以及从市场和铸币厂听来的新闻……新闻是每个英国人(见面时问的)第一个问题”^②。1629 年，诺福克(Norfolk)的劳斯(Rous)也曾让他的邻居停下来问他“有什么新闻”^③。以至当时就有人曾言：“这是一个新闻的时代。”^④由此可见，新闻在当时社会中的流行度和重要性，从而也为我们展现出近代早期英国的新闻文化^⑤。

那么对于近代早期的英国人而言，“新闻”到底指什么？什么样的消息才可能被称作新闻？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新闻”有 Newes、Newis 等多种写法，指代新的事物、消息(Tidings)、对新近事实的报告、新闻传播者、报纸等意思，这一词被广泛使用约在 1500 年前后。因此广义上，“新闻”是指最近发生事情的新消息，可被人们作为谈话和报道主题的新事件^⑥。但这样的定义并不准确，上述形式的新闻或许只能引起某个个体的兴趣。因

① R. Copland. *The Seven Sorowes that Women Haue when Theyr Husbandes be Deade*. London, 1565.

② J. Florio. *Florios Second Frutes to be Gathered of Twelue Trees*. London, 1591.

③ M. A. E. Green(eds.). *Diary of Joha Rouse*, Original Ser., Vol. 66.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56, p. 44.

④ F. P. Verney & M. M. Verney(eds.). *Memoirs of the Verney Family during the Civil War*,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Co. 1892, Vol. 1, p. 179.

⑤ 这一领域近些年来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如 J. F. Levy. “How Information Spread Among the Gentry, 1550—1640”, *Journal of Britisb Studies*, 1982, 21(2), pp. 11~34. R. Cust. “Ne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985(112), pp. 60~90.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3. A. Fox. *Oral and Literatur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等。不过相关研究对新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兴起背景等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讨论。这也是本文所要进一步探讨的。另本文讨论时段主要限定在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之后的内战及复辟时期有其特殊性，需另行考察。

⑥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n., Vol. 1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374.

此本文中的“新闻”更多是指一种能够引发公众兴趣和交流的新信息。

从内容来看,当时的新闻主要包括政治、宗教、社会、邻里以及某些奇人异事等。政治方面主要涉及有关国家和政府的一些重要事件或人物,例如战争、王位继承、王室政策等。宗教方面主要是宣传一些教义以及某些圣徒事迹。社会方面主要是有关犯罪的一些新闻,如对审判的描述等。邻里方面主要是报道一些纠纷等。奇人怪事则主要讲述一些灾难、怪物、怪胎故事等。就类型来看,主要分为国内和国外。国外方面更多涉及政治性新闻,比如战争和宗教纷争等;国内方面则涵盖上述各个方面。就作用来看,主要有三个:传递消息、道德教化和政治讽刺。

交流和传播需借助一定形式的介质和载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介(Medium)。因此我们根据媒介的不同,将英国这一时期的新闻分为几大类型:口耳、手书和印刷新闻。

口耳新闻主要指从嘴巴到耳朵、从耳朵到嘴巴的新闻交流形式,包括谣言(Rumours)、口头吟唱的诗歌(Ballads)、布道辞(Sermons)等。手书新闻包括新闻信(Newsletters)、新闻单(Separates,即只有一页的新闻信)等,主要流行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具有读写能力的乡绅、教士或社会中上层中^①。最后是印刷新闻,它的出现具有很大影响,它使新闻传播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包括小册子(News Pamphlets)新闻、新闻书(Newsbooks、Newspapers)新闻等。在形态上,新闻小册子一般为四开本(Quarto)8到96页长的未经装帧或简易装帧的小书^②;新闻书一般为四开本的8至24页长的连续性新闻出版物(serial publications),出现在17世纪早期(约1620年代)^③。

不过,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定发展阶段,同时也呈现出一定变化,有其兴起的客观条件。

一、新闻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新闻文化的初步形成

都铎时代(Tudors)是英国16、17世纪新闻文化兴起的一个主要阶段。特别是在都铎晚期,新闻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和都铎早期,英格兰的国王就运用《王室公告》等来传播新闻或进行宣传^④,但是新闻媒介的多样化和新闻文化的繁荣主要出现在都铎晚期,亦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最明显的是小册子新闻的快速增长。在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公众有了更多接近或阅读小册子的机会,并且由于与西班牙的冲突以及法国宗教战争的影响,这种情况在1580年后更甚^⑤。

小册子新闻的主题范围较广,涵盖很多重要事件,包括英格兰1569年的北方起义;法国宗教战争、荷兰与西班牙的战争等^⑥。在新闻性质上,很多著者或编撰人都非常强调小册子内容的真实性,经常套用“真实的报道(A True Report)”等标题来表明其报道的真实性,有的还提及目击证人及消息来源的权威性来加大其报道的可信度,以此吸引公众和读者的注意^⑦。

小册子新闻的读者包括社会上层,如贝德福德伯爵(Second Earl of Bedford)就拥有很多小册子,包括《低地国家的实时战争报道》等;贵妇格雷(Lady Grey)也收藏了不少当时的新闻小册子,如《法王关于

① D. Randall. "Joseph Mead, Novellante: News, Soc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06, 45(2), pp. 295~297.

②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 5.

③ J. Schleck. "'Fair and Balanced' News from the Continent", *Prose Studies*, 2007, 29(3), p. 326.

④ P. L. Hughes and J. F. Larkin.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3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1969. J. A. Doig.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Royal Proclamation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Historical Research*, 1998, 71(176), pp. 253~280.

⑤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p. 98~108. S. Clark, *The Elizabethan Pamphleteer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3, p. 86.

⑥ W. Gibson. *A Description of Nortons Falchod of York Shyre*. London, 1570; *Newes out of France*. London, 1591; *An Aduise and Answer of my Lord ye Prince of Orenge*. London, 1577; N. Mears.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lizabethan Real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0~151. M. Gibson(eds.). *Early English Trail Pamphlet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⑦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 105.

平息法国国内动乱的敕令或公告》等^①。与此同时,由于小册子的价格较为低廉,因此也进入到不少普通民众,如小手艺人(craftsman)等的家中^②。

这些小册子新闻报道的目的主要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如有些小册子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有些则有着浓重的道德说教色彩,例如在一些报道怪胎故事和自然灾害的小册子中,经常会提到怪胎和自然灾害的出现是上帝给予人们的警示,是对所有人的忠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新闻是结合了时人的知识背景进行编写和报道的^③,进而使其自身具有更大价值,它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到必要的信息,同时也使他们懂得报道背后的内涵。

就地域来看,在当时的英国,伦敦是当之无愧的小册子新闻的中心^④。这些新闻小册子主要是在圣保罗(St. Paul)大教堂的庭院内出售。书商和出版商一般在这里会有自己的店面。虽然对于单个小册子的印刷数量难以估计,但据有学者统计,一般一本一至两张纸(one or two sheet)的小册子在两三天内的印刷份数可达 250 至 1500 之间^⑤。除伦敦外,这时的小册子新闻也已广泛流存于英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贩是将小册子带到地方的主力军之一^⑥。

在伊丽莎白时代,手书新闻也在社会中受到普遍运用。时人梅钦(H. Machyn)就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发生在宫廷周围的新闻,包括女王、大臣的各类活动等。如 1559 年 4 月,梅钦提到温特沃斯(Lord Wentworth)因丢失加莱(Calles)从伦敦塔里被提审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进行传讯的情况;以及伊丽莎白一世在圣乔治节对贵族进行封爵的情景^⑦。

此外,新闻信对于贵族、乡绅之间或与外部的信息沟通十分重要。例如 16 世纪 90 年代,普罗比(P. Proby)就经常利用书信等方式向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以及其它达官贵人传达他们不在宫廷期间的新闻^⑧。伦敦人张伯伦(Chamberlain)也经常将在圣保罗获得的新闻和消息通过信件形式告知给他的朋友圈^⑨。新闻信不仅从中央传向地方,同时也会从地方传向中央,如康沃利斯爵士(Sir Cornwallis)也将地方新闻传给他在伦敦的联络人^⑩。

口耳新闻也同样具有活力。在社会中上层,贵族和乡绅通常会利用家仆去传达口信和信息,仆人也从主人那里听到有关来自外部的消息。例如 1587 年,仆人佩里(L. Perry)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些地方散布他从他主人那听来的一些假消息^⑪。有不少关于国王或重臣的谣言都在流行,诸如前任国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仍然在世并被囚禁在伦敦塔等^⑫。同时,那些通常以手书或印刷形式存留下来的有些文本,如王室公告、皇家敕令等通常也会以口头形式传达。例如有人就曾记载到:3 月,在宫廷和街上,王室公告被宣读传阅,人们得知法王和苏格兰女皇正在号角声中和大队兵士的陪同下前来^⑬。一些涉及政治、宗教或道德的诗歌等也会被竖琴演奏人、吟游诗人、流浪歌手以及卖主和顾客在旅店、啤酒

① 24 *Of August*, 1578. *A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Wars in the Lowe Countrys*. London, 1578; *The Edict or Proclamation Set Forthe by the French Kinge vpon the Pacifying of the Troubles in Fraunce*. London, 1576. N. Mears.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lizabethan Realms*, p. 161.

② T.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 - 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61 ~ 264.

③ T. Day. *Wonderfull Straunge Sightes Seene in the Element Over the Citie of London and Other Place*. London, 1583.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p. 109 ~ 110, 115.

④ 这是近代早期英国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工商业和政治地位的加强、人员流动的加剧等原因,伦敦成为当时英国的新闻传播中心,特别是在印刷新闻方面。

⑤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 80.

⑥ T.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 - 1640*, pp. 265 ~ 267. M. Spufford.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London: Methuen, 1981, ch. 5.

⑦ J. G. Nichols ed. *The Diary of Henry Machyn*, Original Ser., Vol. 42.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8, pp. 195 ~ 199, 261 ~ 264, 280 ~ 281.

⑧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 - 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 388.

⑨ S. William ed. *Letters Written by John Chamberlain*, Original Ser., Vol. 79.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61. W. Notestein. *Four worth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9 ~ 119.

⑩ J. Scott-Warren. "News, Sociability and Book-buy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Library*, 7th Ser., 2000, 1, pp. 385 ~ 402.

⑪ A.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 - 1700*, p. 347.

⑫ A.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 - 1700*, p. 349. Mary A. E. Green,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1601 - 1603, with Addenda, 1547 - 1565*. London, 1870, p. 525.

⑬ J. G. Nichols ed. *The Diary of Henry Machyn*, pp. 229, 311 ~ 312.

馆以及其它公共场合公开或私下表演或吟唱^①。例如当时的一首歌谣就被用来谴责西班牙的政治野心：(西班牙人)

在我们面前夺去我们少女的贞洁
残忍地痛打我们摇篮中的孩子
上帝知道他们的意图
就是要摧毁和夺去
我们尊贵女王的生命和王位。^②

与小册子一样，伦敦也是伊丽莎白时代口耳新闻传播的中心，其中仍以圣保罗大教堂广场为重心。除此之外，奇普萨德(Cheapside)和兰帕德街(Lombard)以及皇家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也是各种新闻的汇集和讨论之地。在伦敦城中，各个教区也是口头新闻传播的集中场所，这点同样体现在地方上，因为教区不仅是布道和教会活动的地点，同时也是王室公告经常宣读的地方，更是各地居民聚集和讨论新闻或流言之地^③。另外旅店等为来往的旅行者既提供了落脚之地，同时也成为他们新闻汇聚和讨论地，他们不仅可以在其中张贴告示，同时也可以阅读小册子等^④。同样，旅店等有时也是私人 and 官方信件的投放地和诗歌兜售人的买卖场所，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来此，因此也更容易引发争执和辩论。这种情形同样可以发生在啤酒馆中，并且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增长，为这一时期口头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更多机会^⑤。

综上所述，在都铎时期特别是晚期，新闻借助于多样的媒介比以往传播得更广，也更深入。人们拥有自己的新闻网络，通过联络人、邻居、朋友、商人、旅行家等收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将全国编成一个大的新闻网，从而为这一时期新闻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使得时人对国际时事和全国性事务的了解更为便捷，在沟通政治、道德教化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也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新闻文化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新闻文化的逐渐成熟与政治批判性的不断增强

经历了都铎晚期的快速发展，新闻文化在斯图亚特王朝(The Stuarts)早期显现出进一步繁荣趋势。虽然新闻媒介形式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仍以口头、书写和印刷形式为主，但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讽刺和批判性不断增强。

1603年，苏格兰的国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因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嗣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史称詹姆士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但詹姆士一世宣扬君权神授，坚持英国国教的地位和主教制，并且在外交和用人政策等方面行为不当，从而加剧了臣民对国王的不信任。其子查理一世(Charles I)继位后，国王与议会、臣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他在宗教上大力推行信仰划一政策；在征税上实行强迫借贷(Forced Loan)，并最终实行个人统治(Personal Rule)。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新闻更多以宫廷和中央政府为主要关注对象，人们对政治新闻的诉求和敏感度更为强烈，新闻与政治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影响国王、政府与臣民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17世纪前期，英国人对新闻的渴求更趋明显，并首先体现在口耳相传中。至少至17世纪早期，能够识字的英国人不仅自己阅读新闻，而且还经常把新闻朗读给不能识字的人听^⑥。特别是在斯图亚特早期政治危机开始逐步显现，政府对印刷品的审查更为严格之后，口头新闻由于其私密性和相对安全，

① T.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 pp. 11~37.

② Cf. D. Zaret. *Origins of Democratic Cul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5.

③ N. Mears.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lizabethan Realms*, pp. 168~171.

④ A.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p. 352.

⑤ P. Lake. *The English Alehous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Higher Education, 1983, pp. 41~43, 155~160. N. Mears.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lizabethan Realms*, pp. 171~172.

⑥ R. Cust. "New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p. 65~66. J. F. Levy. "How Information Spread among the Gentry, 1550-1640", p. 24.

因此在地位和作用上变得更为显著^①。例如在 1627 年,劳斯在其日记中提到他是如何通过别人的私下谈论得知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远征法国的失败以及时人对公爵这次远征的讽刺(虽然政府对外宣称这场战争将会取胜):

法国人进攻你,你就逃跑了。
这是真的么?你不是在出征前吹嘘
将会把他们吓退出海岸线?
你的声望不是能吓住他们么?
拉姆^②的保护也不能让你免受法国人的进攻么?
难道你妈妈的弥撒、十字架或者
巫术不能使你避免这致命的失败么?

关于强迫贷款、议会解散的新闻也是通过口头形式在地方上广为流传,并对时人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听到征税和议会解散的消息后,时人曾提到:国王将会失去民心,因为他对他们征收了这么多的税赋;如今议会也解散了,国王和臣民的关系也将就此终结^③。

谣言是不可信的口头新闻的极端表现形式。发生在威斯敏斯特的诸事成为每个人嘴上的“新闻”,口头方式成为最快和最好的表达形式。“人们将会在皇家交易所、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那里告诉你一切新闻,在这你可以获得比世界上其它地方多得多的消息。”^④这些口头新闻或谣言有些是关于“君主的生死”,有些是关于“君主的健康”,宠臣也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这种讨论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治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 1620 至 1630 年代,宫廷丑闻的不断传播引发了人们对国王查理一世的不满;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分野渐渐明晰;关于天主教阴谋的刻板印象也逐步形成。时人在热烈议论查理一世对议会的解散,攻击劳德大主教,直至最后演变为对宪政原则问题的讨论等,这些都为君主与臣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埋下了伏笔。正如时人所评价的:“国王还没一个乞丐好……甚至他比乞丐还坏,他的下场将会更悲惨”,“(我们)是否可以合法地拿起武器就涉及宗教和良心的诸事上反对国王?”、“如果国王不能遵守法律和誓言,……那么他应该知道他将会被废黜”^⑤。

手书新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更快发展。首先是新闻信,除了在中上等阶层中继续流行外,这一时期还开始出现了更多的职业新闻信写作人(Newsletter Writers)。他们主要由地方乡绅或贵族雇佣,在伦敦成为其代表,收集信息,包括在宫廷发生的事情、议会的演说和来自国外的新闻^⑥。例如赫特福德郡(Herfordshire)的斯丘达莫尔爵士(Sir Scudamore)每年支付 20 镑给波瑞(J. Pory),让他替自己收集信息和新闻,并每周写信报告最新消息^⑦。此外,这一时期新闻单从只对某个重要事件进行报道转向更广阔的领域,凡是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政治事件都进行报道,尤其是对议会中相关事件的报道,成为时人了解议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⑧。

这种新闻信或新闻单的传播首先沟通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与口头新闻一样,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央和宫廷的政治不断透明化,引发了民众对于中央和国王政治的担心,促成地方公众形成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和两极化的政治态度。例如正是通过新闻信等方式,住在德文郡的杨格(Yonge)知晓了中央和宫廷的政治形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和态度^⑨。1626 年,时人米德(Mead)也记录到:国王承担了白金汉公爵的所有罪责,并且要使议会下院认识到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以至于米德认为,议会将会在一周内休会。几个月后,米德甚至提到,国王已经公开表达了对议会的不满,他向枢

① R. Cust, "New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65.

② 拉姆(Lambe)是白金汉公爵的宠幸之人。

③ *Diary of John Rous*, M. A. E. Green ed. pp. 19~22. A. Fox, "Rumours, New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Elizabethan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97, 40(3), p. 618.

④ J. Smith, *Advertisements for the Unexperienced Plandters of the New England*. London, 1631.

⑤ A. Fox, "Rumours, New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Elizabethan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pp. 613~619.

⑥ D. Randall, "Joseph Mead, Novellante, News, Sociability, and Credi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295~297.

⑦ J. F. Levy, "How Information Spread among the Gentry, 1550-1640", p. 21.

⑧ R. Cust, "New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63.

⑨ G. Roberts ed. *The Diary of Walter Yonge*, Original Ser., Vol. 41.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8, pp. 98, 109~110.

密院宣称，他是多么厌恶“议会”这个名字^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那些手书新闻的读者中，有很多都是对 1620 年代和 1630 年代（政治）持有异议的人，而他们也正是 1640 和 1650 年代议会的支持者^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对立。

最后是印刷新闻。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在印刷新闻方面发生较大变化的是除了小册子外，新闻书开始出现。詹姆士一世将出版新闻书的垄断权首先授予了巴特(N. Butter)等人。虽然多数情况下，新闻书报道的是国外新闻，但也给喜欢批评政府政策的读者提供了素材，如盖恩斯福德(T. Gainsford)就因经常编撰新闻书上的新闻而成为枢密院眼中的可疑人物和搜捕目标。并且新闻书暗地里对詹姆士一世的外交政策持一种批评态度，因为国王这时与作为天主教代表的西班牙走得过近，而巴特本人则是新教的强力支持者^③。因此可以理解查理一世为何后来会取缔全部的新闻印刷品。由此也可看出，斯图亚特早期的王国政治并非和谐，而是存在着对国王政策的批评和不同声音。

至于新闻小册子，这一时期基本与都铎晚期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迎合市场和公众对于政治新闻的需求，小册子新闻也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例如这一时期著名的小册子《人民之声》(*Vox Populi*)，1620 年在伦敦和低地国家就有九个印刷版本。它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公开指责詹姆士一世对西班牙的屈服。

国王正在完成两件对英格兰来说是致命的事情：一是对清教徒的厌恶和阻止未来所有议会的召开；二是强化大不列颠与低地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歧，加大它们之间的隔阂，以保证它们可以被西班牙和奥地利各个击破。……国王对这个小册子的出版非常愤怒，因为它非常不合时宜。^④

奥弗伯里(Sir Overbury)宫廷丑闻也通过小册子形式为人所知。它与手书、口耳新闻一起将一件普通的谋杀案“转变”为一场针对国王的宫廷丑闻，从而损害了詹姆士一世和当时的宫廷形象，并引发了时人对天主教阴谋的担忧^⑤。不仅如此，还有小册子在大肆攻击国王宠臣白金汉公爵所犯的罪行，例如将其描绘成是毒杀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凶手^⑥，引发了公众对于查理一世继续任用白金汉公爵的质疑。因此，至 1620 年代之后，对于读者而言，小册子新闻与公众辩论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成为之后英国内战时期小册子繁荣和政治吸引力加强的先兆和基础^⑦。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新闻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更快发展，而且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这尤其体现在其政治批判性上，在为时人传播政治消息的同时提供了接近和讨论政治的机会，并逐步演化成对国王及其相关政策的议论和不满，甚至触及一些具有宪政性的根本原则。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就“三十年战争”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国内政策而言，很多民众不同意那些高层所做出的决定和行动^⑧。这在某种意义上为英国内战的爆发开创了先机，也展示出新闻文化对当时政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文化兴起的客观因素

为何 16、17 世纪英国会形成较为繁荣的新闻文化，其兴起究竟具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条件？对此，我们需做进一步的考察。

① T. Birch(eds.). *Court and Times of Charles the First*, 2 Vols.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8, Vol. 1, p. 104. R. Cust. "News and Politics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75.

② S. A. Baron. "The Guises of Dissemin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B. Dooley and S. Baron, eds.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53.

③ S. A. Baron. "The Guises of Dissemin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44.

④ J. O. Halliwell ed. *The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Simonds D' Ewes, Bart.* 2 Vol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5, Vol. 1, pp. 158~159.

⑤ *The Bloody Downfall of Adultery, Murder, Ambition*. London, 1616. Richard Niccols. *Sir Thomas Overburies Vision*. London, 1616. A. Bellany. *The Politics of Court Scand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⑥ G. Enlisham. *The Forerunner of Revenge*. Frankfurt, 1626.

⑦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 128.

⑧ S. A. Baron. "The Guises of Dissemin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42.

近代早期是英国历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作为从中世纪向近代迈入的过渡阶段,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层面均出现了不同于中世纪的一些新特征,而这也为新闻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近代早期是英国逐渐走向统一、国家不断实现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重要时期。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动荡后,都铎王朝建立。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君主开始在政治上进行集权,国家权力获得了不断增长^①,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第一个凝固剂。法律是另一个促使国家整合的因素。据统计,仅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 37 年中所颁布的法律就在《王国法令》中占据了 1032 页,而从《大宪章》颁布到 1509 年总共也只在其中占有 1092 页^②。从维护和强化国家政权、处理宗教事务到管理社会经济、法律改革以及调节个人或地方利益,几乎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③。此外,宗教改革也为国家实现整合提供了契机。虽然英国宗教改革充满着复杂性和艰巨性,转变也非一蹴而就,但英国以新教为主,建立起了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自从 1588 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多数人将(是否是)新教徒看成是(是否是)一个英国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④

这些因素都为国家不断实现整合提供了条件。“国家”的观念开始不断显现^⑤,而这种“国家”观念的出现也促使了近代早期英国民族意识的逐步形成:

英格兰人啊!倘若你们知晓,你们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你们的山川地域是多么丰饶,你们就会一次次地俯身拜倒在上帝面前,感谢他的恩典,使你们有幸生而即为英格兰人,而不是法兰西的农夫,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德意志人。^⑥

因此,人们的观念不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地方。例如当时一位住在柴郡(Cheshire)的乡绅格罗夫纳(Sir Grosvenor)有时会用“country”一词指代柴郡,但有时也会用其指代“公益(common good)”,即能超越单纯地方主义,只将地方作为组成部分的“国家”观念^⑦。因此“全国性”事务逐步进入到地方视野,这就为新闻的需求扩大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多可能。

近代早期也是英国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封建主义不断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中叶,基本上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和商品销售网络。

作为首都,伦敦在经济方面成为全国的中心。1520 年代,伦敦人口大约 6 万,至 17 世纪末时,超过 57 万,占全国城镇人口的近一半^⑧。人口的膨胀使得商品的消费和供应出现迅速增长,因此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例如伦敦的粮食谷物等主要从沿海各郡的埃塞克斯等地取得;肉类主要来自相对较远的威尔士(Wales)及英格兰北部;园艺水果来自肯特(Kent)等地;呢绒则主要由埃克塞特(Exeter)供给;东北部的纽卡斯尔(Newcastle)则向伦敦供应煤^⑨。

与此同时,伦敦作为对外贸易与各郡间贸易的中心,也向全国进行转运贸易,成为各种国内外商品的再分配中心,主要包括:食品、原材料(羊毛等)及制成品(服装等)等。这些都使伦敦针对国内市场的转运贸易非常发达^⑩。

地方性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获得较大发展。小城镇(市场)大约有 600—800 个;较大的城镇有 70—100 个^⑪。其中小城镇成为地方集镇的聚集地,以其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地方性市场。大城镇主要包括作

① J. S. Morrill.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 3.

② A. G. R.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2nd edn. London: Longman, 1997, p. 89.

③ G. R. Elton.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15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t. 2, Index of Bills & Acts. D. Dean. *Law-Making and Society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84—160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s. 2-7, Index of Acts & Bills.

④ 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London: Arnold, 1987, p. 117.

⑤ 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p. 100.

⑥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21 页。

⑦ R. Cust and P. Lake. “Sir Richard Grosvenor and the Rhetoric of Magistrac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81, 54, pp. 40~53.

⑧ C.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ety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198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7.

⑨ 赵秀荣:《1500~1700 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65~68 页。

⑩ 陈曦文,王乃耀:《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72~75 页。

⑪ 赵秀荣:《1500~1700 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第 73~76 页。

为地方社会和政治中心的“郡级市(County Town)”，如杜伦(Durham)、约克(York)^①等。这些大城市作为地区性市场的中心，成为连接地方与伦敦的纽带，从而初步建立起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

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带动了水陆交通的发展。水路方面，泰晤士河(The Thames)成为重要通道，詹姆士一世时期，到牛津等地的航道也可通行，伦敦附近的内河航运更加发达。英国是一个岛国，这一独特的地理特征使其拥有许多优良港口，成为商品运输，特别是大宗物品，如煤、金属等的重要路线。与此同时，陆路交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伦敦与全国各地联系越来越密切。道路数从 1541 年 9 条增加至 1570 年 17 条^②。17 世纪早期，出现了运送商品、旅客及书信的定期陆路运输服务。1637 年，每周从伦敦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郡的陆路货运服务有 272 个之多。通过马车、驮马(Packhorses)等方式，商品等被运送到全国^③。

无论是商业的发达还是交通的便利，都为人口的流动提供契机。近代早期是英国流动人口显著增长的时期。一般而言，进行长途流动的人主要有几类，一是来自于社会中上层，包括乡绅、商人以及职业阶层(如律师、医生等)等，他们经常会前往伦敦等地处理事务、接受教育和寻觅仕途。其次是那些最穷苦的人。由于农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如歉收、圈地等)，那些失去土地、需要糊口或无法在某地获得长期工作的人，都不得不到处奔波寻找新的生存机会。此外，兜售商品的小贩和流动商人也是流动人口中的常客。伦敦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人口流动最显著之地。1550 年代，1060 个伦敦人里，只有 17% 是出生在伦敦本地。至 17 世纪，八分之一的英国人在有生之年至少会去伦敦一次^④。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近代早期的人口流动是当时社会和人口的常态，是人们惯常的生活方式。”^⑤

正是上述经济联系强化、道路交通改善以及人口流动加快等因素，为新闻的广泛和快速传播提供了客观上的人员、物力条件，成为其传播的便捷渠道。

此外，教育也在近代早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在 16 世纪晚期到 17 世纪上半期，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变得更多。各种形式的学校不断创办，入学率也得到了提高。16 世纪末，基本上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小学校(Petty Schools)”。许多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也建立起来。据统计，从 1560 至 1640 年，有 29 万 3 千镑的私人捐助来帮助创建文法学校；1603 至 1649 年间，文法学校增加了 142 所。大学教育同样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牛津、剑桥以及伦敦四大法学院的入学人数都出现了较快增长^⑥，出现了“教育革命(Educational Revolution)”^⑦。

与教育扩展相联系的是识字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前期和 17 世纪上半期。就社会阶层而论，贵族、乡绅、商人等由于受教育机会更多，所以识字率也较高。在 1580—1700 年间的诺里奇主教区(Diocese of Norwich)，在被统计的 450 位乡绅中，只有 2% 的乡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的 441 人既能写也能读。而同一时期职业人士和神职人员的识字率为 100%；约曼农(yeoman)为 65%；商人和手工业者为 56%；农民为 21%；劳工为 15%，妇女为 11%^⑧。17 世纪初，伦敦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能够签名的人占到了其自身总数的 76%^⑨。至 1641 年，全国约有 30% 的男性人口具有签名能力。由于当时学校一般先教读后教写，所以可以肯定，能够阅读但不会书写者的比例要远高于此^⑩。得益于教育等的发展，近代早期英国人的识字率在总体上有所提高，特别是在 16 世纪下半期^⑪。

因此，随着这一时期教育和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受到商业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的推动，普通人对于

① 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revised edn. Harlow: Longman, 1997, pp. 77~78.

② W. Besant. *London in the Times of the Stuarts*.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03, p. 195. 赵秀荣：《1500~1700 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第 58 页。

③ 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p. 81.

④ 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pp. 7~8, 81~82.

⑤ P. Clark. “Migra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Later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1979, (83), p. 72.

⑥ 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p. 86.

⑦ L. Ston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60—1640”, *Past and Present*, 1964, (28), pp. 41~80.

⑧ D. Cressy. “Levels of Illiteracy in England, 1530—173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77, 20(1), p. 5.

⑨ P.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in B. Reay(eds.).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 49.

⑩ B. Capp. “Popular Culture”, in B. Reay 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p. 199.

⑪ 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 p. 87.

阅读的兴趣和数量出现了较大增长,这也为新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智识上的基础。他们希望并且也能够阅读契约、法庭记录及《圣经》^①、日常新闻等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件和书籍。

而印刷术的传入则为人们的阅读要求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1476年,英国人卡克斯顿(W. Caxton)将活字印刷术引入英国,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家修道院中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卡克斯顿印行了90多本著作,并且大部分用的是英语。卡克斯顿死后,其事业主要由其助手沃德(Worde)继承。从1492至1532年,沃德一共印刷出版了700多本著作。1535年沃德死后,伦敦的印刷业发展迅速。至1560年,一共有不少于70个主要印刷商在印行书籍。印刷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从1520年代的550种,增加到1530年代的739种,1540年代的928种,1550年代的1040种^②,以及1558到1579年间的2760种,1580至1603年间的4370种^③。到内战期间,伦敦书商托马森(G. Thomason)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就收集了1.5万种印刷小册子及7000多种小报^④。正是通过这些廉价的印刷品,广大英国公众既学习了知识,同时也获得了“消息”和“新闻”。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这一时期新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进而更有利于新闻发挥更大的作用。统一国家和民族意识使人们能够跳出地方视野,引发人们对于全国性事务和新闻的关注,也有利于打破地方上的壁垒,使新闻传播至各地;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道路交通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则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渠道;教育的发展和识字率的提高可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理解新闻;印刷术的传入也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它与之之前流传下来的口耳相传及手书等形式一起,共同推进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广度和速度,从而有利于英国在16、17世纪形成具有特色的“新闻文化”。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新闻文化在英国16、17世纪得到了较快发展。在都铎晚期,逐步形成了以口耳、手书和印刷新闻为基础的格局,尤其是小册子的显著增长,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便捷,在人们了解时事和进行道德教化等方面具有作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虽然新闻传播格局未有太大变化,但由于政府专制倾向的加强,使得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政治批判性更甚。虽然这一时期政府对政治新闻的控制有所强化,但是有关国内的新闻仍通过口耳、手书等形式进行传播;与此同时,出现了更为固定的印刷新闻形式:新闻书,这些都促使此时新闻的广泛传播,并对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加速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新闻文化的兴起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特性有着密切联系,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使得我们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性质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还远称不上是“信息社会”,但近代早期英国人对于信息和新闻的兴趣以及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信息的重视和强调,它绝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离世界”。这样的特性又反过来为我们从新闻文化等角度去考察整个近代早期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可能,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 作者简介:蒋 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yjiang12@126.com。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7002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2YB029)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新教强调能够自己阅读和理解上帝之言(God's Holy Word)和公祷书(prayer book)等。

② H. S. Bennett. *English Book Reader, 1475-1557*,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94.

③ H. S. Bennett. *English Book Reader, 1558-16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69.

④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7. P.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pp. 31~58.